

Annette Lareau

#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Second Edition

## 不平等的童年

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

第2版

[美] 安妮特·拉鲁 著 宋爽 张旭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nette Lareau

#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Second Edition

# 不平等的童年

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

第2版

[美] 安妮特·拉鲁 著 宋爽 张旭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0764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第2版 / (美) 安妮特·拉鲁 (Annette Lareau) 著；宋爽，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301-27093-6

I. ①不… II. ①安… ②宋… ③张… III. ①儿童教育—研究—美国 IV. ①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3119号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2e by Annette Lareau  
© 2011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8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第2版）  
Bu Pingdeng de Tongnian  
著作责任者 [美]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著 宋爽 张旭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09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mailto: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印 刷 者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60毫米×960毫米 16开本 30.75印张 400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目 录

第一章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1
第二章	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	16
<b>第一部分</b>	<b>组织日常生活</b>	<b>39</b>
第三章	协作培养的忙碌节拍：加勒特·塔林格	42
第四章	孩子的节拍：泰雷克·泰勒	76
第五章	孩子的玩要是孩子的事情：卡蒂·布林德尔	97
<b>第二部分</b>	<b>语言的运用</b>	<b>123</b>
第六章	发展孩子的能力：亚历山大·威廉斯	125
第七章	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工具：哈罗德·麦卡利斯特	158
<b>第三部分</b>	<b>家庭和教育机构</b>	<b>193</b>
第八章	组织机构内的协作培养：斯泰西·马歇尔	195
第九章	跑偏了的协作培养：梅勒妮·汉德隆	216
第十章	让教育工作者带路：温迪·德赖弗	235
第十一章	遭皮带毒打，又害怕“上学”：小比利·扬内利	263
第十二章	社会地位的力量和局限性	278
<b>第四部分</b>	<b>不平等的童年与不平等的成年</b>	<b>307</b>
第十三章	家长对孩子生活的了解程度及干预情况上的阶级差异	309
第十四章	对纵向民族志的反思和各个家庭对本书的反应	362
第十五章	《不平等的童年》的成书背景：定量分析的结果	386

后 记	394
附录一 研究方法：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	396
附录二 理论：理解布迪厄的著作	414
附录三 辅助表格	418
注 释	438
参考文献	480

## 第一章

#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一个晚春的下午，四年级白人男孩加勒特·塔林格正在自家后院的游泳池里，笑着喊着，击水嬉戏。他住在市郊一座有四间卧室的小楼里。和大多数傍晚一样，快速吃过晚饭他的父亲就会开车带他去参加足球训练。踢足球只是加勒特参加的众多活动之一。他的弟弟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场棒球赛。这两个男孩的父母在有些傍晚也还是可以放松下来慢慢去品味一杯葡萄酒的，但今晚却不是这样一个夜晚。当他们匆匆换下工作服并帮孩子准备好去训练时，塔林格先生和他的太太显得很忙乱。

离这里开车十分钟之遥，四年级黑人男孩亚历山大·威廉斯刚参加完学校的家庭招待会<sup>[1]</sup>，正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母亲开着一辆米黄色皮革装潢的丰田雷克萨斯。当时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9:00。威廉斯女士下班后已经很累了，而且第二天还有一个日程很满很忙的星期四在等着她。她一早4:45就得起床出差去另一个城市，一直到当晚9:00才能回来。星期六早上8:15她还要开车带亚历山大去上钢琴课；课后去唱诗班排练，跟着再去参加一场足球赛。当他们在黑暗中驱车前行时，威廉斯女士轻声地和她的儿子谈着话，问他一些问题，并引他讲出自己的观点。

家长与孩子一起讨论问题是中产阶级家庭抚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像很多中产阶级家长一样，威廉斯女士和她的丈夫也认为他们是在“发展”亚历山大的能力，是在以一种协作方式培养他的才干。由父母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支配着像加勒特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中产阶级家

庭的孩子。通过确保他们的孩子拥有这些和更多其他经历，中产阶级家长参与了**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种优越感在制度环境中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这些制度环境中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与成年人讲话。

从这里再往前驱车二十分钟，在一个蓝领工人居民区，以及再稍远一点，在一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公租房社区，孩子们的童年看起来有很大不同。一位白人工人阶级父亲扬内利先生开车到课后加时班去接也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小比利。回到家，小比利先看了会儿电视，然后跑去街上骑车玩耍，与此同时扬内利先生则在喝啤酒。没有课后加时班的晚上，小比利会和他爸爸坐在屋外路边打牌。小比利母亲的工作是帮人打扫房间，她下午5:30左右下班回家。她做好晚饭后，全家一起共进晚餐。大家庭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扬内利女士每天都会打电话跟“整个一大家子”联络。多数晚上小比利的叔叔都会来串门，有时还会把小比利最小的表弟带来一起玩。春天的时候，小比利在当地一个棒球队打棒球。与每周至少参加四项活动的加勒特和亚历山大不同，对小比利来说，棒球是他整个学年中唯一有组织的课外活动。这条街下边，白人女孩温迪·德赖弗也是工人出身，她也是和她的表姐妹们一起度过傍晚时光，一起挤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边吃爆米花边看录像。

更远一些地方，在一个夏日的傍晚，四年级黑人男孩哈罗德·麦卡利斯特正在外面玩耍。他住在那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社区。那天晚上，他的两个表兄弟也在那里，他们经常来找哈罗德玩。整个下午他们都想找个篮球玩但却没找到，之后他们便干脆坐下来看电视体育节目。现在已是黄昏，他们又跑出去用装满水的气球打闹。哈罗德想把他的邻居拉蒂法小姐给浇湿了。人们坐在这排单元房外的白色塑料草坪座椅上。音乐和电视声在敞开的门窗间飘来荡去。

小比利、温迪和哈罗德身边的成年人都想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

经济上的艰难困窘使得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成为这些家长的主要生活任务，他们要挣钱糊口，安排住处，克服住处附近的不安全环境，带孩子去看医生（常要久久地等候那些根本就不会来的公交车），给孩子洗衣服，催孩子按时睡觉，帮孩子第二天一早准备好东西上学。但与中产阶级家长不同，这些家长并不认为协作发展孩子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有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而实现的协作培养）是教育好孩子的必要因素。与塔林格家和威廉斯家不同，这些母亲和父亲并不看重协作培养。对他们来说，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要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想、观点和思想。相反，他们认为大人与孩子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些家长倾向于下达指令：他们会直接告诉自己的孩子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给出理由来说服他们去做事情。和与他们对等的中产阶级孩子不同，这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那些固定的由大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他们对自己业余活动的特性有更多控制权。大多数孩子都跟自己的小朋友和亲戚住得很近，都能自由外出并和这些亲戚朋友玩耍。他们的家长和监护人推动了他们**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sup>[2]</sup>。然而，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仍然需要与像学校这样的社会核心机构配合互动；而这些社会核心机构又都坚决果断地推崇以协作培养方式教养孩子的策略。对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父母来说，他们在家中教养孩子的逻辑与教育机构的标准是不同步的。其结果就是，采用协作培养策略的家长，他们的孩子看起来就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而像小比利、温迪和哈罗德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就在他们的机构体验中得到了一种形成中的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

美国也许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但它也是一片不平等的土地。本书确认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而本书就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通过对中产阶级（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会谈，本书展示了阶级间的



不平等已经渗入组成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将汇报一些科研成果；这些成果是通过对十二个家庭在其子女处于9-10岁之间时进行的深入观察研究而得到的。我认为，家庭生活的各个关键要素紧密结合，整合成一套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sup>[1]</sup>。换言之，各类不同家庭的不同之处，看起来会聚合成各种有意义的模式。在人类历史的这一时刻，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倾向于采用这样一种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他们注重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父母则趋向于采取成就自然成长的文化逻辑。在成就自然成长的逻辑中，孩子们体验到长时间的闲暇时光、自发的嬉戏、大人与孩子之间分明的界限、每天与亲戚之间的交往。尽管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却常常拥有更“像孩子”（该拥有）的生活，没有大人的干预，他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对自己长长的闲暇时光也拥有更多的控制权。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漏失了与亲戚之间的联络和自己的闲暇时间，但他们看起来却（至少是在潜能上）获得了在（教育及其他）机构中重要的优势。从协作培养的经历中，他们学到了各种对将来进入工薪世界可能会大有好处的宝贵技能。在我的研究中，虽然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孩子与黑人孩子确实显示出一些重大不同之处，但最重要的差距并不是发生在同种社会地位内部，而是像我即将展示的那样，存在于不同社会地位之间。正是这种不同阶级地位之间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如何在家庭生活与抚养孩子中体现出来的，促成了/影响到孩子们在与身外世界发生联系时对他们自己的看法。

## 文化技能库

以儿童为工作对象的专业人士，像老师、医生和辅导员，通常都能在如何抚养孩子上达成一致看法。当然，有时他们也会就某个孩子或家庭该如何去践行教养孩子的标准而产生分歧。比如，老师们也许会对

家长是否要停下来纠正孩子在朗读时不正确的发音而产生分歧。辅导员们也许会对一位母亲是否给了她的孩子过多保护而有不同看法。但在通过正确教育子女来促进孩子身心发展的主要原则上，专业人士之间却极少会有分歧<sup>[4]</sup>。这些原则包括与孩子交谈、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在孩子的求学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动作用的重要性。与此相似，家庭教育的指导方针所强调的主要是同孩子讲道理、教他们通过协商而非武力来解决问题的重要性。由于这些指导方针早已深入人心，又由于这些方针都聚焦在一套家长应该如何养育孩子的行为规范上，它们也就组成了一套关于怎样培养孩子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技能库**（dominant set of cultural repertoires）。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渗透了这种在抚养孩子的主要原则上为专业人士所普遍赞同的文化技能库。如此这般，一小部分专家也就塑造了众多家长在教育孩子当中的行为方式。

过去一百年来，专业人员针对教养孩子的最佳方法所给出的建议，发生了很有规律的变化——由从前极力推崇的牛奶喂养、严厉管教、使用体罚（对父母娇惯孩子作出严重警告），到现在同样极力推崇的母乳喂养、对孩子流露温情暖意、使用讲道理和交涉协商的管控机制来教育孩子。中产阶级家庭父母的言行在方方面面都要比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父母转变得更快也更彻底<sup>[5]</sup>。当专业人员的建议从牛奶喂养转向母乳喂养、从严加管教转向温暖怜爱、从责打体罚转向冷静反省，正是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最及时地响应了这些建议<sup>[6]</sup>。而且，最近几十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还不得不去面对“财富衰减”的前景<sup>[7]</sup>。中产阶级家庭父母为孩子日后的安身立命感到焦虑，因此他们也就越来越坚决地让孩子抓住机会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只要这些活动能为孩子日后事业发达带来好处。

那些遵从专业人士提出的标准并参与到协作培养模式中的中产阶级家长，都会有意设法去激励孩子的发展，培养孩子的认知技能和社交技巧。在当前特定的经济挑战和养育孩子的艰辛重压下，工人阶级家庭和

贫困家庭则在满足孩子的衣食住行及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上不断挣扎。但是，它们在通过让孩子参加有组织的业余活动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这方面却是大有欠缺。在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中，支持孩子的自然成长被视为一项成就<sup>[8]</sup>。

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养哲学和方法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简单来说，它们导致父母向孩子**传输差别优势**（transmission of differential advantages）。在本项调研中，中产阶级家庭中的谈话交流远多于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而也正是谈话交流，导致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能够更好地发展其敏捷的口头表达能力、拥有更多词汇量、在权威人士面前表现得更为安适自如、对抽象概念更加熟悉。重要的是，不同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在与学校等机构中和家里的权威人士的交流互动中也养成发展了不同的技能。像加勒特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当他们还是小男孩时就学会了与成年人握手并在互动中注视着成年人的眼睛。在有关工作面试的调研中，研究人员发现，求职者只有不到一分钟时间来给雇主留下好印象。因此，研究人员都强调眼神对视交流、握手坚定稳健和在面试中表现出对雇主应答自如十分重要。然而，在像哈罗德家这样的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在聊天时并不注视对方眼睛。而且就像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指出的，在他们住处附近，长时间与人对视还有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sup>[9]</sup>。哈罗德家代代相传的社交能力是有价值的，但这些躲避危险的能力（例如，在求职面试中）就有可能没有加勒特和亚历山大学到的能力那么有价值。

本项调研中的中产阶级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还都表现出一种逐渐生成中的中产阶级所特有的**优越感**（sense of entitlement）。他们的言行显然都透着自己有权追求自己的个人偏好，也有权积极主动地管控自己在各种组织机构场景中参与的互动。他们看起来在这些场合下都舒适自如，他们很坦率地分享信息并要求得到别人的关注。虽然总是会有比较外向的孩子也总是会有比较内向的孩子，但中产阶级孩子都会去做的事情就

是转化互动并使其对**他们**有利。亚历山大知道怎样让医生倾听他（对自己用了新除臭剂腋下长出肿块）的担忧。他的母亲明确地训练并鼓励他对医生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想法。中产阶级黑人女孩斯泰西·马歇尔也是如此：她的母亲教导她，体操老师的教学应该配合她的个人学习风格。就这样，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社会的）游戏规则”中得到了各种训练，而这些规则都是支配与组织机构的各种代表形式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法则。不过，这些孩子对其他很多重要社会技巧却不熟悉，比如，在长周末和暑假自行安排业余时间，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发表长篇大论，或是以一种服从的、不过分炫耀的方式与成年人相处，等等。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还（在模仿中和直接的训练中）学会了如何让各种规章制度有利于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中产阶级家庭中大力强调的论证和商谈，也对孩子日后在各类组织机构中的商谈提供了潜在的优势。除此之外，那些有权威的人士也对这样的互动作出了正面回应。甚至是在四年级，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就俨然开始代表自身利益来为自己取得优势。他们向老师和医生提出各种特殊要求，让对方调整措施来迎合他们的需求。

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各种组织机构的场合下与他人互动时，则表现出一种逐渐形成中的**局促感**（sense of constraint）。他们很少有可能去改变同他人的互动来为自己所用。与其父母一样，他们只是被动地去接受权威人士的行为（虽然有时他们也会暗中进行反抗）。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父母有时并不了解自己孩子的在校情况（比如，有时他们不知道孩子没有写完家庭作业）。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还会因为觉得学校的规定毫无道理而对其置之不理。比如，温迪的妈妈告诉她对纠缠她的男孩要“拳脚相见”；小比利的父母为自己儿子在操场上“殴打”另一个男孩而感到骄傲，尽管小比利因此而被停学。家长们还会在要求“校方”对他们的忧虑作出回应这类事情上遇到各种困难。扬内利女士在发牢骚说她“恨”校方时，她也在无形中教育了儿子在面对一个重要的组织机构时只能表现出无能为力和失意挫败。

而像斯泰西这样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则学会了向专业人士提出各种要求，当他们成功地将各种规则为自己所用时，他们也就增加了自己未来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即个体继承下来的各种技能，这些技能可以在他们行走于各种组织机构之时被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价值）<sup>[10]</sup>。然而，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在面对组织机构时，通常都无法让各种规则为自己服务，进而也就无法为成人后的生活获得资本。由于有这些合法化的模式，依照协作培养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就能以一种逐渐生成的优越感的形式获得各种优势，而依照自然成长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则倾向于发展出一种逐渐生成的局促感<sup>[11]</sup>。

## 社会分层和个人主义

美国的公共舆论大都把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归因于这个人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品质。像“我行我素”（I Did It My Way）这样的歌曲、个人传记、电视节目和杂志上的文章都在赞美个人的力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个人成就与个人的努力和天赋连在一起，如具有好强的“A型”人格、工作努力或是有领导才能。这些文化信念为美国人对不平等的看法提供了一个框架。

实际上，与承认社会地位的力量相比，美国人要更容易承认个人的积极主动性。研究表明，美国人大都相信他们的成就来自他们个人的努力。只有不到20%的人看到“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或阶级地位对‘出人头地’极其重要”<sup>[12]</sup>。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相信他们能凭自身力量来提高其生活水平。换言之，美国人相信这样的美国梦：“我们从小到大都相信的这个美国梦，虽然简单但却十分强大——只要你努力工作并按规则办事，你就会得到机会来实现自己，让你的天赋得到充分发挥。”<sup>[13]</sup>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生活的结果负责——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抱有这种美国式意识形态的信念，无论穷富，皆是如此。

然而，毋庸置疑，社会的确是有阶级和阶层之分的。就像我在下一

章将要展示的，很多非常宝贵的资源，像拥有财富、有一份令人感兴趣又有复杂性的高薪工作、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座家宅，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均匀分配的。而且，这些资源还是代代相传的：预测一个孩子是否有一天能从高校顺利毕业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一看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否有大学文凭。当然，诸如此类的关联也非绝对：有三分之二的社会成员会重现他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有三分之一的人则会另谋他路。尽管如此，同样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分布极其不均的社会里；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里。然而，在下一章中我将向读者展示，很多通情达理之人都不能在如何从这样的社会模式中抽象出最好的理论上达成一致。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家庭是否“享有独特的、能界定其生活轨迹的经历”<sup>[14]</sup>这一点上，他们之间也有分歧。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并没有一种清晰连贯、持续恒常的体验模式。我将在书中证明，事实上存在这样一种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它确有因不同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特征的倾向。我把这些相互交错的各种实例视为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以一种杂乱但仍可辨认的方式集合在一起。与很多人不同，我的看法是，社会地位的确对塑造家庭生活的日常节奏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 调研本身

带领孩子度过一天的学习和生活真的是一种很繁重的劳作，尤其是对孩子的父母来说更是如此。当我开始着手进行这项调研时，我就对了解这种劳作的过程十分感兴趣。我选择了观察整个家庭，而不是仅仅观察孩子或家长，这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些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我的研究方法也意味着要走出家宅的四壁来了解父母和孩子是怎样与孩子生活中的其他成年人磋商行事的。

本书基于密集的“自然主义”观察法，对十二个有9-10岁孩子的

家庭（六个白人家庭，五个黑人家庭，一个混血家庭）进行了调研。这十二个家庭是一项更大调研的一部分，整个大项目包括从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中取样的八十八个孩子<sup>[15]</sup>。（关于调研方法的细节，参见附录一。）我初次见到这些孩子们还是在探访他们所在的几个三年级班时；当时我一共访问了两所小学，一所是市内的下里士满小学，另一所是郊外的斯旺小学（下一章对这两所学校有详细介绍）。在白人和黑人研究助理的帮助下，我首先访谈了所有孩子的母亲们，而后又对很多孩子的父亲们做了访谈。为了更好地了解专业人员对家长所抱有的期望，我还访谈了孩子们的任课老师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

从这群孩子里，我和我的研究助理们选出十二个家庭来作进一步密切观察<sup>[16]</sup>。对每一个家庭，我们通常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到他们家中及附近地区进行二十次访察。在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完成每日例行的琐事时，在他们参加学校活动时，在他们参与教会仪式及活动、有组织的游戏和竞赛、亲戚来访和看病时，我们都跟随他们进行追踪观察。大多数访察都会持续三个小时，有时依据活动自身性质（例如，一次在外市的葬礼，一次所有亲戚都参加的特别活动，或者是一次长时间的购物旅行）我们也会逗留更长时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会在每个孩子家里安排一次过夜访察。我们经常随身带着录音机，尤其是在这些家庭对我们的在场都习以为常之后。

当我们把自己介绍给每个家庭时，我们告诉他们，就像一项著名研究里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被当成“家里的宠物狗”<sup>[17]</sup>。我们希望家长们能忽略我们的存在，但同时又允许我们跟着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存在还是有了些许更主动的特性。不过在最初的一些纷扰过后，我们通常都会融入背景，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定下自己的步调。在他们家里，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坐在地上；出游时，我们也坚持坐在他们私家车的后排。在室外，我们与孩子们一起打球或是在他们与小伙伴玩耍时也跟他们在一起。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往往要花很长时间等待成年人来接他

们去参加各种活动。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等待。正如我在附录一中所说，凭经验所得的规则就是，如果小孩子没有在当下就面临危险，就不要批评或干预。我们鼓励他们不要担心没有招待我们；我们告诉孩子们在我们面前要自然放松，如果他们通常会骂脏字，他们就还在我们面前也骂脏字；我们还要他们对我们放下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对待“客人”的规矩。

当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当我们坐在车后座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足球赛，当我们看着孩子们换上睡衣或是和他们一起坐在教堂，我们的存在无疑改变了当时那个空间里的互动。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看到他们已经适应了我们的存在（例如，随着他们对我们变得习以为常，大声吼叫和用脏话骂人的次数开始增多）。尤其是在最初的适应期过后，很多家庭都报告说，如果非要说他们的行为有什么变化的话，这些变化也是很小的。

孩子们都觉得参加这个项目很开心。他们汇报说，这件事让他们感到很“特别”。每每看到实地调研工作人员来到自己家中，他们都显得非常高兴；有时他们还不愿让工作人员离开。有时候，有些家长也会说他们“很开心”。这项调研明显给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欣喜，这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孩子很少与自己的大家庭、邻居和老师以外的成年人打交道。而在中产阶级家庭，孩子们则会定期与家庭成员及学校环境以外的成年人进行互动。

## 恒久的两难境地

在我近来参加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位黑人人类学家驳斥另一位学者的论述说：“你说的没错，但这是从白人视角来看的。”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其结论就是：一个人是否是某个种族或民族的成员塑造了这个人的知性轨迹。因而，有些人便相信，作为一个白人女性，我不该去研究黑人家庭。反之亦然，他们也反对黑人研究助理去访察中产阶级白人家庭。



庭。他们断言，让同性恋者去研究同性恋者、让女性去研究女性才是更理想的，甚至是必须如此的。有些人担心局外人会生出很多误解。还有人声称，让白人研究人员在黑人家中作研究是件不合理的事。

对于这些争议，实在是没有简单的应对之计。这项调研的设计是从当地的环境背景中产生出来的（参见附录一）。但概言之，我与那天晚上研讨会上那位年轻女子哲学观不同。我质疑那一所谓的“白人视角”是否存在<sup>[18]</sup>。按照她的批判逻辑，就意味着（占优势地位的）种族和民族不该去研究任何涉及劣势群体的社会问题。这种逻辑并不能打动我，也无法让我觉得这就是了解复杂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法。（这种逻辑还会造成另一个不公正的后果，就是迫使每一位黑人社会学家都只去研究美国黑人，而不是自由地去研究他们感兴趣的任何人群。）再者说，眼前的“人群”总是纷繁多变。如果是同一个民族中不同性别的人群呢：阻挡我们去理解他们的壁垒是否同样高不可攀？在一系列重叠反射的镜子里，这样的张力是否意味着你唯一真正能“跨越障碍”去研究的人就是你自己呢？本书的观点是，局外人有可能越过人群界限去研究其他群体。我们在本书中向读者报告了一项运用人种学方法研究身处各种社会场所的儿童的调研：其中既有男孩又有女孩，既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也有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既有白人孩子也有黑人孩子。此外，调研小组成员也是由各种不同的种族和民族（以及不同的社会地位背景）组成的；这一点，就像附录一所示，也影响到了我们在访察中所获悉的东西。

有些审稿人担心，在当前美国紧张的种族关系下，本书描述的行为模式会巩固人们对某些群体的负面形象所固有的偏见。他们担心调研结果会被人脱离原有环境以滥用自肥，尤其是那些政治上的保守派。初期的一些看稿人还鼓励我不要报出那些有可能会加固人们对弱势群体（如贫困黑人家庭）负面印象的结果。事实上，原稿中就已包括了对贫困白人家庭及黑人家庭的描写，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能完全缓解这些担忧。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大部分读者都将是中产阶级的读者，或者是正在向